

刘振声

兵学

与

中医学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刘振声



BINGXUE

GYIXUE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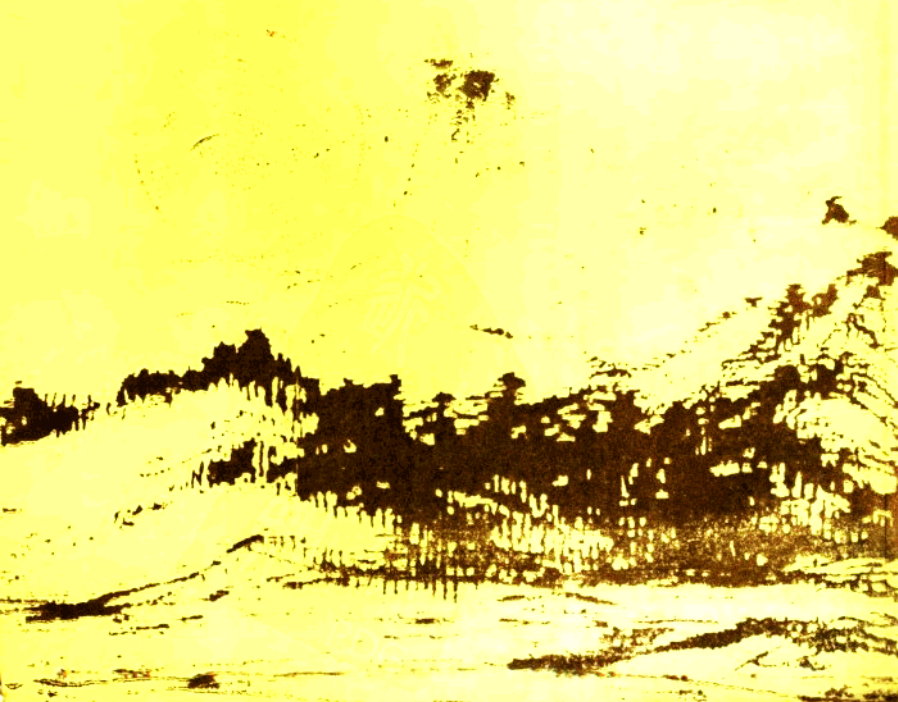
学术顾问：

费孝通 赵朴初 潘一合 戴建华

耿鉴庭 裘沛然 邓铁涛 俞振华

主 编：陈可冀

副主编：江幼李



序

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华夏文明息息相通。我从医四十年，临床诊疗之余，着力涉猎卷帙浩瀚的中医药学典籍，深深感觉到中国传统医药学思维和现代医药学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医药学在哲理上重视宏观思辨性，与后者比较，很具特色，在它身上，处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脉络，看到中国医药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或嚆矢；这使我对探讨光辉耀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间的血缘关系，滋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为标帜所展示的阴阳概念，是日后传统中医学阴阳理论的哲学背景：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聃《道德经》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的议论，也可体察到中医学中关于“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理论体系的特色和“天地是大宇宙，人身是小宇宙”的道文化的历史轨迹。《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在中医临床诊疗中，阴阳辨证是中医最基本的诊断模式，据此得以立法处方。中医学最有权威性的典籍《黄帝内经》不少章节，也是在老子“养生之道”的基础上发挥的，因而世有“黄老之学”之谓。庄周宗老子之论，有《养生主》独立篇章，并提倡老子静态气功，实为今日丰富多彩传统养生术之滥觞。《道藏》中的《钟离八段锦》、《太清导引养生经》，更是影响深远，流传到今，富实用性特点。

我出生福建，幼年时代在家居和社会闾里中，几乎天天看到“求佛给众生治病”的举动，这也许就是不少香港老百姓所说的

“佛是大医王”、“佛是大药师”的意思。《药师经》称“老、病、死”是人的生理上的三种病，“贪、瞋、痴”是人的心理上的三种病；《大藏经》的论述医理，《易筋经》及《延寿经》之历久不衰，以及以“戒学”为基础的“佛家气功”，物我两忘的“坐忘”，今人仍在汲取其精华而行于保健防病。印度传统医学受佛学影响也很深，足迹未泯，所以 1981 年出访印度时，我对参观位于恒河沿岸之瓦拉纳西（Varanasi）的释迦牟尼故乡的佛教殿堂倍感兴趣。

说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中华文化大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还有更多生动的实例。《尚书·洪范》五行体系之在中医药学术中的兴替；《吕氏春秋》“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的音乐舞蹈疗法思路，对后人皆多所启迪。至于殷墟甲骨文卜辞，马王堆汉墓帛书，龙门石窟医方及敦煌所见之中医药文化，皆十分诱人。他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周书·五会篇》及《汉书·平帝本纪》关于医疗养生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间之种种胶柱。

为了比较系统地阐发华夏文化与传统医学的因缘，三年前，在我回福建省亲时，与福建科技出版社谈及出版丛书的萌想，不意竟得到他们的很大共鸣，多方支持和鼓励。为此，我们着手这一比较吃力的工程。《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将囊括中医学与远古文化、周易、儒文化、道文化、佛学、兵家、文物学、饮食文化、传统美学、文学、艺术、天文学、象数、史学、典章制度、民族学及民俗学等之间的联系，探隐溯源，继承发展。

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我们衷心感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

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俞长荣教授担任顾问。赵朴初先生在与本丛书《佛学与中医学》作者耿刘同、耿引循访谈时，还曾议论了荀子“食气者寿”、孔子“治人事天莫为嗇”、庄子“性与天道”及老子“心物不二”的论点与中医学及养生学的关系，至为可贵。

我希望本丛书对于开创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探究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种种奥秘，起到那怕是一些推陈致新、继往开来的作用，就很满足了。丛书中各分册作者的学术观点可能不尽一致，有些是历来便有争议的，为了尊重各流派的观点，不强作统一，留供大家作进一步争鸣，而后完善。是为序。

陈可冀

壬申年霜降日于北京西苑

同年冬至日改写

目 录

序.....	陈可冀 (1)
第一章 结 论	(1)
第一节 战争刺激了兵学与医学的发展	(2)
第二节 兵学与中医学的源流	(7)
第三节 兵家时空观念与时间医学	(11)
第四节 兵家天时气象观与医学气象学	(15)
第二章 战略战术与中医理论	(18)
第一节 《司马法》的“仁本”与医为“仁术”	(19)
第二节 《军争》与中医理论	(21)
第三节 “八阵”与张介宾的《新方八略》	(25)
第四节 《吴子》的“料敌虚实”与中医的诊察	(26)
第五节 尉繚子的“权谋”与中医的法则	(29)
第三章 兵家术语名词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32)
第一节 奇 正	(32)
第二节 虚 实	(34)
第三节 主客与邪正	(36)
第四节 疾战与急证急攻	(38)
第五节 刚 柔	(40)
第六节 地 形	(41)
第七节 表 里	(43)
第八节 水攻火攻	(44)

第九节 喜 怒	(45)
第十节 反间与反佐	(47)
第十一节 兵学与药物命名	(49)
第十二节 青龙、白虎和朱雀、玄武	(50)
第四章 兵家哲学思想与中医学	(53)
第一节 从“气”表精神到“气”表物质	(54)
第二节 “天时、地利、人和”与“天人合一观”	(57)
第三节 兵阴阳学派与“阴阳学说”	(59)
第四节 箕子五行与《内经》五行学说	(63)
第五章 仲景学说的兵学内涵	(65)
第一节 六经常变观	(66)
第二节 审时度势	(70)
第三节 预 防	(73)
第四节 截 断	(76)
第五节 安内攘外	(78)
第六节 攻补兼施是治法的核心	(82)
第六章 兵学与历代医家	(86)
第一节 《鬼谷子》与皇甫谧	(86)
第二节 “纵横捭阖”与陶弘景	(87)
第三节 河间学派的开山之祖刘完素	(89)
第四节 《景岳全书》的兵学内涵	(92)
第五节 “奇正”与杨继洲	(95)
第六节 “疾战”的吴又可	(96)
第七节 《孙子兵法·地形》与柯琴“六经正义”	(98)
第八节 “用药如用兵”的徐大椿	(100)
第九节 创卫气营血辨证的叶天士	(101)
第十节 “治外感如将”的吴鞠通	(103)
后记	(105)

第一章 绪 论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个大系统，而儒文化、道文化、佛学、兵学、中医学……等等，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尽管某个子系统在某个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但都是归属于大系统之中。大系统的科学内涵是广泛的，它吞吐儒、道、佛、兵家、农家、天文、地理、数学、物候、哲学、文学等等。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包容百家、兼采古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系统。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另方面又显示了民族文化的千姿百态，流派虽有别，其源则同，都是根植于大系统之中，受大系统的孕育而产生。

作为子系统的兵学与中医学之关系，本书大体上分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从源到流，阐明了战争与兵学、中医学发展的关系。二、分析了两大学科——兵学与中医学的源流、发展流变及学科交叉、影响、渗透、引申、移植、衍化、交融诸问题大端，运用史论与医论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全方位、多侧面、深层次地阐明其内在关系，包括哲学思潮、特点与缺陷、得与失、特殊与一般、建构与失衡等方面。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三、兵学先影响于《内经》、《伤寒论》，后影响于历代医家学说。故以《内经》《伤寒论》为重点论述，历代各家学说作为“面”上的阐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盖非“点”不足以溯源；非“面”不足以窥见其发展流变。这是本书结构的特点。

第一节 战争刺激了兵学与医学的发展

在上古，我国就是一个多战争的国家。轩辕黄帝曾征蚩尤、伐赤帝，历七十余战，撰《握奇文》的兵学著作。战争固然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导致热性病的流行，但也刺激了兵学与医学的发展。

《内经》虽系托名黄帝所作，但也是祖述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等人遗意，犹如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样。汉·张机《伤寒杂病论·自序》说：“上古有神农、黄帝，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及阳庆……”可见，黄帝是一位既通兵学，又精于医学的人物。

兵家伊尹，也具有这个特点。伊尹先事伐桀，出则为将，后为汤相。看到战争带来的热性病流行，悯生民疾苦，才撰成《汤液经》。张机所说的“博采众方”，多是伊尹遗意。如《金匱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的泻心汤方（大黄、黄连、黄芩）即是“伊尹三黄汤”。

先秦时期，战争更是频繁。仅据《春秋》记载，242年里面，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450次，总计933次（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公元前314年，乐毅下齐七十余城。279年，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齐燕间的战争，首尾长达35年。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之战，秦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赵军后路的战法，使赵军腹背受敌，无法冲出重围。赵国“纸上谈兵”的赵括在战场上被秦军击杀，白起残忍地坑赵卒40万（除幼少的240人外）。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尚不包括战争过后疾病流行死亡的统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争，丰富了兵家的实践。鉴于战争的

残酷性，进步的兵家已认识到应以“仁本”为第一，如《司马穰苴兵法》；有的认为必须“疾战”，尽早结束战争，如《孙子兵法·作战篇》。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兵学各家学说纷呈，又产生了像《管子》这部兵学与医学的跨学科著作。与此同时，位居五霸之一的齐国也时常对外讨伐，因战争导致金疮、烧烫伤的疾病时有发生，从而刺激了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像《扁鹊外经》、《白氏外经》、《黄帝外经》（据《汉书·艺文志》）等可能属于外科方面的著作。

秦末农民大起义，大规模的楚汉战争等战争实践，则为《黄石公三略》提供了丰富而又实际的经验教训。汉初各种思想的融合，黄老道家的流行，则为《三略》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而战争使尸体横陈，血染河川，其散发的病毒（古人称为“疫气”）均能引起疫病的流行。自古本有温病，只是医家详寒而略温。西汉淳于意、太仓公所用的“伊尹三黄汤”，实际是治热病之方，只是《难经》、《伤寒例》（王叔和）将热性病归入广义的伤寒。战争并直接带来外科的发展，如80年代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便有“治金疮肠出”的内容，说明远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医家就开始大胆尝试处理腹壁、肠管等方面的手术。

公元前154年，早有反汉预谋的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共7个王国，以清除君侧（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汉景帝用周亚夫为将，才平息了叛乱。但叛乱虽平，疫病丛生。实际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内经》“三论”（指《素问·热论》、《刺热论》、《评热病论》），都是因战争过后，热病流行，作者才针对这些热性病的治疗进行认真总结而汇编入《内经》一书的。可以说，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到汉代，开始孕育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著作如《灵枢》、《素问》。汉末的一次疫病流行，连建安文坛著名的七子——徐干、陈

琳、应瑒、刘楨也难逃其厄（详《曹丕答吴质书》）。曹植称其病因是“疫气”（见曹植《说疫气文》）为患，陈琳也说是“恶疫”。他的《替曹操答孙权书》说：“赤壁之战，孤遭恶疫，烧船自还，非周郎所能败也。”不久，他自己也死于这场恶疫。以致曹丕无限伤感：“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高阶层的士大夫尚且如此，至于人民则处于战乱流离失所与疾病缠身的两面夹攻之中。就是《伤寒杂病论》作者张机的家族，因汉·建安元年疫病蔓延，宗族二百余人，不到10年，就死去三分之二，其中伤寒热性病占十分之七。（据《伤寒杂病论·自序》）十分之三是什么病？张机未明指，但据《郭沫若文集·历史编》第四卷引陈方之的研究，推断为“鼠疫”。张机曾感叹，“痛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战争环境磨难，但也玉成他撰著《伤寒杂病论》16卷。

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造成了大量的金疮、骨折病人，刺激了与之相关的外、伤科理论研究的进展，产生了华佗的《中藏》、《内照》两篇著作。当时外科为时势所重，是带头学科。正如双流张先识所说，“华佗之学，精于张机，今取《中藏》、《内照》二篇读之，其所著论，往往与《灵》、《素》、《难经》相为表里。”（见张氏著《后汉书华佗传补注·序》）

公元291至306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称“八王之乱”；继后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使人民陷入名副其实的“乱世”。战争使医家皇甫谧、陶弘景先后转来注释兵家纵横家类著作《鬼谷子》三卷（据《隋书·经籍志》），陶弘景除注《鬼谷子》外并撰有《古今刀剑录》……等书。陶为避战乱，隐居句曲山中；齐高帝拜他为左卫殿中将军，梁武帝几次礼聘不出。战争连绵不绝，外伤病人大大增加，必然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陶弘景所著《名医别录》说：“桑白根皮消水肿、腹满脐胀，利水道，去寸白，缝金疮。”

据《刘涓子鬼遗方》、《小品方》、《删繁方》都有腹壁损伤和肠脱出或吻合的治疗内容。隋代医著《诸病源候论》便记有“金疮初伤候”、“毒箭所伤候”、“金疮肠出候”、“金疮肠断候”、“箭镞金刃入肉骨不出候”等带有战外伤特点的病证名目。

隋是一个短命朝廷。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战争的胜利，吞没了杨家王朝，建立了李唐政权。唐太宗与李靖，君臣间谈论《兵法》，总结战争实践，称其书为《李卫公问对》。孙思邈避战争之乱，隐居著述，撰《千金方》也有关于战外伤方面的记载。虽有贞观、开元之治，人民稍得喘息，但不久，唐玄宗时“安史之乱”达8年之久，使“开元盛世”转入战争的环境之中。

宋代民族矛盾激化，民族战争居于主要位置。战争磨练出了岳飞、李纲、宗泽等名将。与此同时，外科理论已形成体系，出现了临江陈自明辑《外科精要》三卷，著论五十余篇。提出外科疮疡并不是局部的病变，而是关系到人体脏腑气血寒热虚实的变化，故治疗疮疡不能单纯注意局部的攻毒，而要从脏腑气血全局的变化来考虑，远较魏晋时期的刘涓子《鬼遗方》更具体而深化。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窝阔台汗、蒙可汗，长期对中国北方和南方用兵。赵宋南渡以后，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铁骑所至，使当地人民蒙受深重的战争灾难。战争产生了像《太平圣惠方》（指折伤、金疮门）、《圣济总录》（指折伤门）等比较完整的外、伤科学著作。长期战争导致热性病的流行，使伤寒旧法不能适应热性病的治疗，实践使刘完素认识到“伤寒是热病”，并提出“古方不能治今病”的主张。正由于“离火为戈兵”；战争是因，热病是恶果，金元医家才不囿于仲景详寒略温之论。刘完素又长于治火，阐发火热病机，以救时弊。

明代中叶，倭寇经常扰乱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各地，使得明政府穷于应付。早从金英学过医的张介宾不得不弃医从戎。

曾任广运使的贾堂说过，张介宾前后跋涉于榆林、石凤城，足迹到鸭绿江边（《景岳全书·序》）。战争促使张介宾、杨继洲等医家都穷研《兵法》。

崇祯辛巳年（1641），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其后才有吴又可的《温疫论》问世。所谓的“异气”为患，正是后金·努尔哈赤与崇祯朝廷的几场战争所造成的。

清·康熙五十七年，有讨伐准噶尔的战争，造成了温热病流行，其后又见叶香岩的《温热论治》一书问世。清·纪晓岚说：“乾隆癸丑间，京中疫，以景岳法治，十死八九；以又可法治，亦不甚验。桐城一医（指余师愚）以重剂石膏（指“清瘟败毒饮”）治冯星实之姬人呼吸将绝，应手辄痊，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四斤者。踵其法者，活人无算……”（《阅微草堂笔记》）嘉庆“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温病条辨·序》），吴塘的好友推荐吴塘出来拯救生民。“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温病条辨·上焦篇》）说明吴塘已认识到战争与疫病的关系。由于医家各自的实践不同，从而招致清代寒温学术两派之争。争论的结果，从《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一端，走向定鼎于叶香岩，经薛生白、吴塘、王士雄等完善的谈温学派的一端。

综上所述，古代战争固然促使兵学的发展，也因为战争造成了疫病的流行，同时又刺激了中医学的发展。从中可以窥见兵学与医学的血缘关系。但战争毕竟是无情的，它也摧残了兵学与医学的有关著作。如先秦兵阴阳学派的著作已不见经传，张机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就遭到兵火的破坏，致使原书16卷残缺不全。

从宏观看，战争首重人事。《太公·六韬》曾说：“夫用兵者，

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确立了重人事以胜天的思想。医疗的对象是人体，受《兵法》“人本”、“保民”、“慎战”等说影响的《素问·宝命全形论》也有“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论述。《内经》从而建构起以“人”为本的生态医学。从传统医学对繁衍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看，它确实实起过调节生态失衡的作用。

传统医学的本质是生态医学，它是以古代生态学思想与原理来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与平衡，并进而研究人体失衡的动因、机制及防治方法的。从对中医学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诸如“天人合一”观、气、阴阳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到，中医学的精髓与科学性在于它已开创了一条生态医学的道路，并逐步建构起中国传统的生态医学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

第二节 兵学与中医学的源流

西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它的理论核心是阴阳学说。《内经》一书受到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它也受到先秦兵学著作《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等的影响与渗透，如《孙子兵法·计篇》提及的“阴阳”，《虚实篇》中的“五行无常胜”；《孙臆兵法·奇正》中的“五行”，其用语都较《内经》成书为早。不但如此，其说渗透入《内经》后经作者一番改造，形成了传统医学体系独具风格的阴阳五行学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阴阳为“变化之父母”，《六节脏象论》举“草”来说明自然界万事万物同战争一样是变化无穷的。只不过《孙子兵法·势篇》论五行时举“色”为例，《六节脏象论》举“草”说明罢了。

《孙臆兵法·威王问》说：“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

莫敢先举，为之奈何？”而《灵枢·玉版篇》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几乎用的是兵家语言。在《灵枢·逆顺篇》还可以找到借《兵法》论述医理的类似例子。如说：“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焯焯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这段医学论述就直接吸收采用了《孙子兵法·军争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兵学思想，只不过《灵枢》作者赋予“气”的医学用语。

汉代是整理兵学、奠定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的黄金时代。张子房、韩信等人都曾在汉初奉诏整理古兵法达 182 家。张机为长沙太守，他的《伤寒杂病论》曾沿用《素问·热论》的六经概念，但在哲学思想、战略意义、奇正常变方面系运用《兵法》奇正、虚实在医学中的反照。其书含有六经常变、审时度势、预防、超前截断、安内攘外、攻补兼施等《兵法》渗透入医学论述的内容。综观《伤寒论》的理论建构：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相互并存，“天人合一”重在以人为本，整体恒动观落实到医疗的直接对象——人体上，而常变与奇正同在。“常变”从哲学、兵学的奇正之义引出之后，一部《伤寒杂病论》文字才脉动筋摇，前后映带，穿插“常变”，以变概常。他是世界上最早运用兵学理论指导医学临床实践的一位医学家，继《管子》之后，开创了古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研究之先例，故其书为“万世法”。诚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说：“张长沙医如汤武之师，无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敌之大小皆可制胜。”

魏晋南北朝，有皇甫谧注《鬼谷子》三卷；齐梁·陶弘景注《鬼谷子》十二篇。并附入带有明显医学理论的《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计十五篇。是继张机之后又一部跨学科的著作。

《本经阴符》论养生问题，其理论渊源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持枢》就是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乃是天时运动，这是不可改变和违背的规律。故《四气调神大论》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唐代兵学著作《李卫公问对》，辨《孙子》“奇正”之术，考《兵法》虚实之源流。孙思邈则提出“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的名言；从孙武“尚智”看，此言不论兵家、医家都会受到教益。正如《时病论》的作者雷少逸阐明这句话的涵义所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此孙真人祝医最确之语也。窃谓治初起之轻证，必须细心，当辨其孰为风而用疏，孰为寒而用温，孰为暑而用清，孰为湿而用利，孰为燥而用润，孰为火而用泻。尤其审其体之虚实，病之新久，在女子兼询经期，妇人兼详胎产。如是者，则用药庶无差忒矣。……至若垂危之重证，必须大胆……”，用兵同样也要胆大心细。

在宋代，“胸中有数万甲兵”的范仲淹，谙熟医学，精通医理。善用方药为民治病，是古代兵家中继黄帝、伊尹之后能通晓医学的代表人物。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经略陕西，联合羌人防御西夏，用兵如神。谚云：“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说明他的指挥艺术很高超。当时军中兵士患呕吐、腹泻、不思饮食，军营又缺医乏药，范公从此钻研医理，找出病因是兵士不服水土，以致脾胃戕伤。他曾采集草药，为士卒诊病熬药。公元1050年，范公因推行“灰历新政”，触犯权贵，遭贬青州。青州一带正流行着一种“赤眼病”。范公亲自汲水采药，配制滴眼药水发放民间，及时制止了这一疫病的蔓延。后来，又发现该地区有中风病人，范公制“白丸子”（半夏、南星、白附子、制川乌），主治中风瘫痪、小儿惊风。其方功在祛风痰、镇

惊厥。”后人为了纪念他，称此方为“青州白丸子”。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赵宋南渡以后，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热性疾病广泛流行，“守古法不合今病”从而提出，详寒略温派自刘完素起为之一变为谈温。他受《周易》中具有兵法内涵“变”的启迪，大胆提出六气致病以火热居多。从而阐发火热病机，并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19条、38种疾病，推衍为94种。其中属火的病机原有22种，又经他推衍为57种。因而刘完素被后人誉为温热派的先驱人物。

明代医家受兵学影响的有张介宾、杨继洲、吴又可三家。张介宾年少时学医，中年投军，读《兵法》。晚年读《易》，撰《古方八阵》、《新方八阵》、《新方八略》，是寓兵学于医学的著作。

杨继洲受何去非《备论》的影响，认为“兵未尝不出于法，法未尝能尽于兵。”的确，自古不独“文无定法”，而且医家也是“法无定规”；法在乎变，不可拘泥。杨将兵法之理运用到针灸的临床实践，开后学不少思路。就两家比较而论，张介宾守法度，而杨继洲善于变化；吴又可更不守伤寒治法之旧，他的创新是战争时代使然。吴受《孙子兵法》及《六韬》“疾战”思想的影响，提出“急证急攻”的学术主张，创“九传”治法，敢与仲景分庭抗礼。“达原饮”实际是运用邪在膜原的超前截断，又与仲景“截断法”暗合契机，“发扬并未脱源”。不能截断，才用大承气急攻，方与药沿用经方，法已起了变化。

清初受兵学影响的医家是傅山。傅山，原为明末儒生，后弃儒习医，兼容兵学、诸子百家之书，注重救时济世之学。他于清·顺治六年（1649）、十一年（1654），曾参加过反清的武装斗争，以《孙子兵法》应用于实战，事败入狱。出狱后，发愤著述，行医济世。